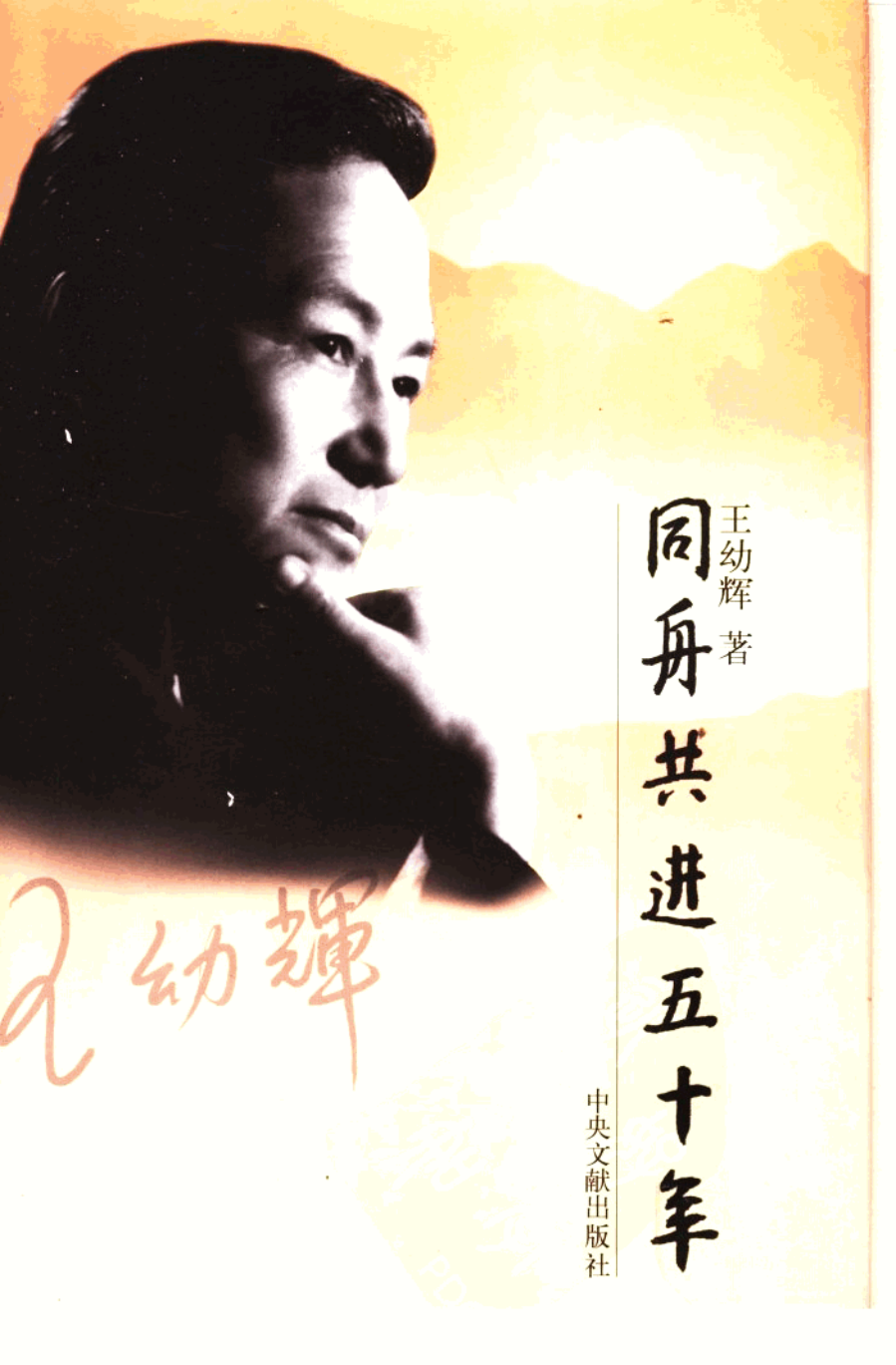




王幼辉 著

同舟共进五十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幼辉

生活厚爱于我

(代序)

诗境闲中悟，人情老更知。过去的几十年就像一首长诗，抑扬顿挫，苦辣酸甜。静下来去思考，确能悟出不少道理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一次简历，就等于体味一次自己的大半生。

我于1934年11月出生于无锡。父亲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母亲读的是师范，父母以教书糊口。那时教员的职业很不稳定，故我的童年是在无锡、南京、苏州、上海的辗转迁徙中度过的。

1953年，我考取了福建农学院。一个城里长大的青年，之所以立志学农，是因为当时电影中苏联的集体农庄深深吸引了我，至今也无怨无悔。在大学里，我是优秀生，同时还是学院的篮球、足球、游泳队队员，我可以横渡闽江。

当那段黄金般的时光即将结束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从此我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一段坎坷，当时我只有22岁。事后想来，或许是自己年轻气盛，过于耿直。但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种“直”劲，就是到后来当了多年“大官”也未改变。38年后，省委给我的评语仍是：性格直率，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抓棘手的事。“直”确实让我吃了不少“亏”，但靠这种“直”，我也为老百姓办了许多事。

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被分配到河北省正定县。当时，只被准许搞农业技术。我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向党和人民表明心迹。从此，我宠辱皆忘、热情地投入到推广农业技术的工作中。风餐露宿、忍饥挨冻乃至“牛棚”改造的生活，我都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孔子有陈蔡之厄，韩信受胯下之辱，一切磨难都是对有声有色人生的新的赐予，人的最高境界，是对降临人生的磨难，永远做艺术化或哲学化的衬托，将其变为丰富自己，激励自己的机会。在农村 20 多年，我没有虚度。我在同困境周旋的过程中激励着自己，充实着自己，塑造着自己，升华着自己。我在为农民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为各类报刊撰写几百篇技术稿子，写了三本水稻专著，培育了几个抗旱水稻品种，推广了麦茬稻种植方法，创造了“水稻中期控氮”技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右派”问题、“美国特务”问题都得到纠正。面对共和国新的春天，胸中又燃起火一样的激情。我决心全身心地扑在田间地头，搞出更多的名堂来。从当县农科所副所长到副县长，我都是努力为之的。

1983 年，我被选为省六届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6 年的基层工作，我深深了解了农村和农民情况，觉得应运用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力，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我在 1983 年主持起草了《河北省农业作物种子条例》、《农业技术推广条例》，作为法律草案，经常委会讨论通过。这是我国第一个这方面的地方法规。

1991 年，在省七届三次人代会上，我被选为副省长。历时 5 年，想来也算扎扎实实干了些事情。

从 1983 年开始，自己可谓身居“高位”了。大概是长期工作在基层的缘故，这些年，我心中始终牵挂着黎民百姓，把

他们的意愿和甘苦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基层群众来访，我倾听呼声；百姓告状拦路，我请其上车倾谈……带着这种平民意识，慷慨陈词也好，奔波忙碌也罢，总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滋味。

1995年，我年满60岁，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又写了一次“老兵新传”。

回顾几十年的路程，虽然有过坎坷，但生活终究是厚爱于我的。青年时学农的志愿变为现实，常被人称作“农业专家”；从当副县长算起，我至今已做了20多年的“官”。如此说来，自己是从两条途径上为社会服务的。2003年3月，由于年龄到限，我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八届政协河北省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新老交替，这是规律。但是，让我铭记于心的不是这些，而是党和人民给予很高的地位和荣誉。时刻想着这些，我就会有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激情和力量。

思于民 报于国

——《同舟共进五十年》（序一）

吴 斌

似一碗白开水。品，没味，再品没味；喝，解渴，解渴就是最大的味。谁能有白开水解渴？酒？牛奶？饮料？逊色了就统统不是味。泰山无影、大象无形，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就是我读了幼辉同志《同舟共进五十年》的书稿之后的感受。

当初我以为这类讲话、调查报告和一些通讯报道，对于一个长期在文山会海出入的人来说，不会有多少吸引力。然而，当我逐篇读下去的时候，不见套话，难觅官腔，既实在，又恳切。那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力透纸背。

处江湖之远，位卑未敢忘忧国；居庙堂之高，衙斋卧听萧萧竹。进也忧来，退也忧，夙兴夜寐系真情。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官居高位，他都念念不忘群众疾苦，切切实实为百姓做事。

在那扭曲的岁月里，他宠辱皆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的需要就是他的追求。有一次，赴京购买化学药品，因易燃易爆，不能上火车，他在近300公里高低不平的土道上骑着自行车，赶了两天半路，把30公斤药品驮了回来。他在正定推广麦茬稻，创造“水稻中期控氮施肥法”，选育抗旱水稻品种“正定2号”……把心血和汗水一把把洒在丰收的土地上。开始农民只知道他是右派，不知道他是好人；后来农民知

道他是假右派，但他更是好人；最后农民就只知道他是好人，而忘记了他是右派。

官居高位后，他依然以拳拳之心惦念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沾着泥巴、顶着高粱花的父老乡亲。他说：“农民养育了我，如果不为老百姓说话，不为老百姓办事，那不成了不孝子孙了吗？”在他担任省人大副主任期间，有一次接到群众上访，石家庄市的一家农药厂，由于生产甲胺磷时排放有毒气体，令周围四万多百姓在三伏天也要紧闭门窗。他听了十分着急，带领十几个部门人员实地调查，他还忍受着酷暑与毒气的熏蒸住下来亲自体验居民生活，搜集第一手资料，终于以有理、有据、有效的措施使问题圆满解决。1993年他在任副省长期间，全省138个县城，只剩滦平还没有自来水，他就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三下滦平，帮助督促当地有关部门探寻水源、规划方案、协调施工。资金紧张，他还亲自到国家有关部委求援，直到解决问题为止。他在张家口坝上考察工作时，看到一所所破旧简陋的卫生院，握着因病致残的老农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对周围的同志们说：“穷乡僻壤的老百姓看病这么难，我们不能只在大城市锦上添花，应该把有限的钱节省出来雪中送炭。”从此，他的卫生工作思路中又多了“三个倾斜”：向农村倾斜、向贫困地区倾斜、向预防工作倾斜。20多年来，慷慨陈词也好，忙碌奔波也罢，他都在为老百姓殚精竭虑，尽职尽责。老百姓说：他没有忘本，是一个有良心，讲义气的人。

他从1983年当选人大代表以来，参与立法、认真监督、带头执法，成了他的庄严使命。他是学农的，又在农村工作了20多年，到省人大工作后，他首先提出“依法治农势在必行”，他起草了《河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条例》，主持起草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河北省水

资源管理条例》、《河北省森林资源管理条例》、《河北省草地管理条例（试行）》、《加强农业的决议》等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的决议草案。这些法规和决议，反映了全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为繁荣农业、发展农村提供了治本之策。

在建议立法之前，他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因而他在政协、人代会上的发言有理有据。1996年3月4日，他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全会“九三”组讨论时呼吁“耕地告急”。江泽民同志听了他的发言称赞说：“王幼辉同志刚才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支持你的意见”。他关于水资源问题的调查和建议，曾引起李鹏同志的重视。他一直关心“南水北调”工程，所以被称为“南水北调”代表。他关于国计民生的很多意见被采纳，并被吸收进国家的法律条文。他还是“农业技术推广法”的最早起草者。

立法后，他还十分注意监督。他在一次人大会上说：在人大工作报告中，都有这样一句评价人大工作的话：“立法有成绩，执法监督不够。”什么时候人大工作报告中说：“立法有成绩，监督很有成效”呢？有法不依，那不是一纸空文吗？在他任副省长期间，不怕得罪人，敢于担风险，严格执法已成佳话。取缔无极县非法医药市场就是个例子。

在离开政府副省长岗位时，省委给他的评语是：“性格直率，顾全大局，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和问题。”

他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地思于民、报于国，是因为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觉悟，当腐败频发、世态炎凉时，忧患者愤世嫉俗，奔走呼号，挺身而出。有社会责任感者，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为

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不想粉饰，但求深刻，抛却虚假，力争务实；他不回避矛盾，不盲目乐观，想得深，看得远。他在政协会上的一些倡议，他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都从国计民生的根本利益出发，热情、中肯、直率、深刻，仿佛使人看到一颗赤诚的心在跳动。

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的品格。他常常告诫自己：“对于国家改革发展之大计，非全力贯彻并落实之，不足以心安；对于有碍社会发展之问题，不痛陈其弊挞伐之，不足以尽责。”尽管有时坚持真理比发现真理还艰难，但他毫不畏惧。

他的品格的形成，是党教育的结果，也是和他的家庭、学校以至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体育教授，母亲也是教师，温实敦厚的家教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报效祖国”之训，从小在他心里扎根。他在中学时代便立志，要么学农，要么学医，将来直接地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点事。他虽然后来受到了挫折，但数十年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结下了深厚感情。与日俱增的恋农情愫，使他在后来走上省级领导岗位后依然同广大农民，情同手足，心心相印。

幼辉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为其书作序，实难避爱屋及乌之嫌，掩卷细思之，也绝非完美无缺。然，其情、其感、其忧、其怨、其倾情的低语、其奋力的呐喊，无不透着一股“真”气，惟此足矣！

2003年7月

一座特别的“立交桥”

——《同舟共进五十年》（序二）

赵培奎

桥，意味着道路的连续和贯通。立交桥，顾名思义，是站立起来又相互交叉的桥。它象征着桥梁建筑的发展，象征着交通事业的发达，象征着交通地处的要道，象征着交会疏通、四面八方、畅行无阻——

《同舟共进五十年》的书稿，我有幸先睹为快，看着翻，翻着看——偶然间，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立交桥”的形象，越想越觉得用一座特别的“立交桥”来比喻，如其书、如其文、如其人。当王幼辉这位部级高官、青春健康型老人，打电话请我对他的书稿提意见时，惊奇的我、惊奇的笑，一名普通编辑和他隔着多少层啊！人说他有平民意识，我听了确感“不平”的非凡。不过一琢磨“立交桥”，豁然开朗了，旨在连接四方的“立交桥”，何论高低贵贱，不是平民也可以通行评说吗？

与王幼辉交往是源于他喜欢《杂文报》，喜欢写杂文，两次邀请我们在一起聊天。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89年《杂文报》创刊五周年时，他是到会的最高领导，讲的话很精彩。拜读他的书稿，有十几篇就是很好的杂文：比如《是“尚方宝剑”还是“橡皮图章”？》、《吃的变迁》、《“天助”勿忘“自助”》、《“黑哨”吹出的不仅是输赢》、《含“水”的成语》等等，有的就发表在《杂文报》上。

杂文是批判的武器、战斗的号角，但可不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相反有的反倒因为写杂文把自己乌纱帽给写掉了。因此一个混迹官场的人，一个没有爱和恨，无所感无所思无所文的人，是不会自讨苦吃，拿杂文去跟别人过不去，跟自己开玩笑的。所以王幼辉对杂文的嗜好，不能用兴趣涉猎的广泛去解释。这是他是非鲜明，敢于碰硬，仗义执言的性格，是文人眼里高官、高官眼里文人的执著，也是用杂文铺设路面，排除障碍，畅通道路的“立交桥”精神的一种折射，说到底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同舟共进五十年》，记录了他自1953年考进福建农学院至今50年的足迹。尤其1983年从正定县副县长的位置，一跃连升四级，进入人生巅峰期之后，展现的不凡人生轨迹。省政协副主席余振中说他是“品种齐全”，不无幽默。相比之下，我倒觉得他的人生像是一座政治立交桥。一条通向人大；一条通向政府；一条通向政协；一条通向民主党派。先后曾任省人大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四大班子，除了无法在党内担任职务，政权机构他快干全了。他不是中共党员，是省九三学社的主委。一位民主人士，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人，在一个省，有这么多、这么高的行政职务，至少恐怕是不多见的。

众多的行政职务，意味着众多的行政职责。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他都有哪些突出的业绩、政绩和贡献？我与他接触缺乏身感实受，不好评价和概括，不过捧书在手，从学者型领导干部的真知灼见，政治业务的较高素质，对党和人民的忠贞激情，在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后，施展抱负才华的建树，是可想而知的。透过省委对他的鉴定：“性格直爽，顾全大局，敢于反映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和问题”，不是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吗？

如嫌不足，众多新闻媒体对他的聚焦，无疑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有力佐证。因为新闻是“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事实的报道”。其中的“关心”和“事实”，体现出来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新闻生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未免过誉，但在记者的眼里，并非哪个领导都是值得去写，尤其是专门写领导个人的新闻。

王幼辉可就不同了。翻开书稿的后面，有许多篇是记者写他的新闻。未收进这本书里还有多少，不知道。其中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华英才》、《团结报》、《中国环境报》等等，光中央一级的新闻单位，就有15家之多。众多记者写他而来，众多媒体为他传播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座新闻的立交桥。新闻报道中，从《为了这些“最可爱的人”》到《侠肝义胆 救死扶伤》、《俯首甘为孺子牛》，从《谁来监督执法者》到《立法方能治本》，从《国力和民心的体现》到《球迷省长》、《“吴桥省长”》，从《“橡皮图章”帽子要自己摘》到《王委员坦诚进言 总书记领首赞赏》，每一篇新闻的背后，都是他脚踏实地，不负众望的心血凝聚；都是他身体力行，诤言卓识的真实再现；都是他同党和人民同舟共进，肝胆相照的生动写照——

汤因比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这里“人类”的集合概念不是空洞的，是由一个个单称概念的“个人”组成的。《同舟共进五十年》里的100多篇文章，包含调查报告、论文、意见、建议、献策、发言、讲话、回忆、杂文等各种不同的体裁，涉及到立法、监督、农业、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反映出来的主要是作者就这些工作职责范围的矛盾和问

题，进行的实践和思考。身居要职，肩负人民的委托和希望，每天都在接触、处理和解决这些四面八方而来的社会中心性问题，作者难能可贵的是，没有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里，不仅有身体力行、卓有成效的实践，更有学者般善于理性的睿智思考。他的思考旨在摆脱人民现实矛盾的困扰，揭示影响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解决纵横交错的社会中心性问题。因此，凝聚着他沉甸甸思考的文集，就像解决交通拥挤的“立交桥”，闪烁着对解决这些社会中心性问题的精辟见解的智慧之光。殚精竭虑的智慧思考和思考的结晶，利在人民，功在社会，必将融入人民和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文明成果中来，载入人民面对自然和社会不断“挑战——应战”的文明史册中来。

一座雄伟的立交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悬在空中。她的坚固，她的巨大的负荷力，源于钢筋水泥的特殊材料，源于依靠大地的坚实基础，源于桥墩的有力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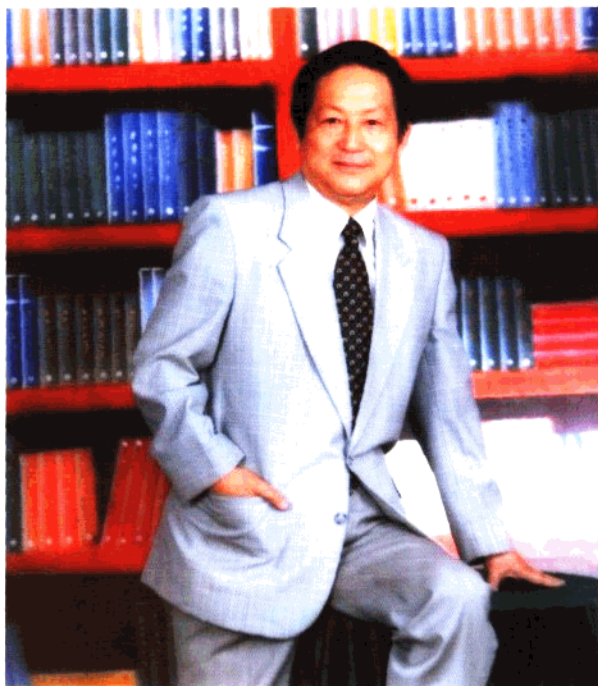
王幼辉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教员，家庭的熏陶赋予了他良好的文化素养。他立志报效祖国，具体选择的是学农的道路，以图将来扎扎实实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实事。由于常年和科学、试验打交道，使他具有严密精确，一丝不苟的事实求实的科学态度。从小对体育的爱好，对游泳的爱好，使他可以横渡闽江，有着向大自然挑战，向人生极限挑战的勇敢精神。在大学里，他是学生会干部，本来响应党的号召，善意的向院党委提意见，不想竟被扩大成了“右派”。逆境，非但没有使他一蹶不振，磨砺反倒使他更加坚强。在正定县26个年头里，勤劳、朴实、忠厚的农民，善待于他，厚爱于他，不仅抚慰了他一颗受伤的心灵，结下了难舍的农民情缘，“平民情结”，更鼓起了他人生奋进的风帆。“正定2号”等多项高产优良水稻品种的试验成功，科技论著和30多篇科

技论文的写作发表，“千里走单骑”的动人佳话——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迈过来、步步登攀，最终筑就了一座人生的立交桥：政治的立交桥，新闻的立交桥，智慧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立交桥，党和人民密切联系的立交桥，担当重任、力顶千钧、造福社会的立交桥，这便是：“一座特别的立交桥”。

2003年5月21日



王幼輝近照



作者简历

1934年11月出生于无锡，自幼在无锡、南京、苏州、上海读书；1953年在上海市考入福建农学院农学系学习。195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正定县工作；1957年至1979年任农业技术员；1979年下半年任正定县农科所副所长；1980年任正定县科委副主任；1980年底至1983年初任正定县副县长；1983年4月被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3月任河北省副省长；1995年任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著作：《麦茬稻栽培技术》、《水稻旱作技术》、《水——永恒的话题》等。

主编：《河北水稻栽培》、《河北的水》、《成功之路》、《新世纪大旅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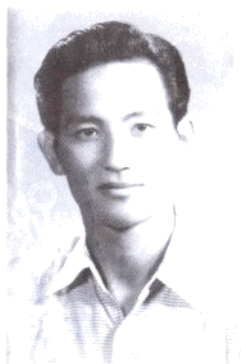
曾任第六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四岁时与父母合影



上小学时与堂嫂合影



大学毕业时（1957年）



与老农观察
水稻生长情况
(1974年)

与农民一道插秧 (右一) (1959年)

